

【盧溝橋事變與對日抗戰80週年專題論述】

論七七事變前之中國抗日禦侮形勢：從地方到中央（1931-1937）

林福隆

壹、前言

在民國以前，中國傳統上是以忠君思想，構建了國家與人民的關係，辛亥革命將君主推翻後，雖則中國以民主政體的形式出現，其實卻進入軍閥領政的時期，而自袁世凱死後，國家陷於分裂，無法凝聚向心，國家權力於是趨於地方化、個人化。¹可說民國建立後，中國政治情況，一直處於中央與地方對抗的型態，彼此間存在著十分複雜的關係。到了北伐時期，因「容共」之故，國共之間紛爭不斷，並造成黨權分裂。國民黨的分裂，更形成軍權獨盛的現象，而軍權又隨著北伐的軍事進展，大肆擴張，造成了軍人新的割據局面。本來北伐的目的，是要打破中國割據的形態，無奈新的地方割據觀念，卻又是在北伐時期養成。²

國民政府完成北伐，表面上結束了中國分裂局面，達成形式上的國家統一，然而國民黨內部紛爭依舊不斷，黨權與軍權始終無法有效統一。原在北伐時期發生的寧漢之爭，當時由蔣中正引退，達成寧漢和解，以及消除李宗仁、唐生智等之亂，但黨權旁落使得軍權膨脹，於是在北伐後形成所謂的南京、廣州、武漢、開封、太原、瀋陽等

1 張玉法，《中國現代政治史論》（臺北：東華書局，民國77年），頁146。

2 蔣永敬，《國民黨興衰史》（臺北：商務印書館，2003年），頁151。

六大軍權中心。³這六個中心，南京為中央政府所在地，由蔣中正主控，其餘分別由李濟、李宗仁、馮玉祥、閻錫山和張學良掌控，於是中國名義統一，實則中央與地方分割的形態不變。對此，國民政府在北伐後企圖藉訓政的施行，以集權中央，謀求政治上的整合，惟以訴諸武力的方式，卻形成了「地方以武力對中央，中央亦以武力對地方」的現象，造成中央與地方的武力相向，⁴以至於中國政治仍處於分裂狀態，中央政府號令所及之地仍屬有限。

外侮之來，必於內鬭，民國20年的九一八事變，正證明了中國自古以來的「人必自侮，而後人侮之」的說法。當時國民黨的內鬭，極其嚴重，先有19年的「中原大戰」、20年春夏之間因「湯山事件」而形成的寧粵對抗，再而長江流域爆發大水災，和共產黨的叛亂肆虐，可說是天災人禍，接踵而至。為求抵禦外侮，必須停止內鬥，尋求團結，⁵此即蔣中正在23年11月，第五次軍事剿共結束後，曾聯名汪精衛通電表示，雖「數年以來，救亡圖存，雖有方策，而推行之際，動多窒礙，分工合作，實效未覩者，則以中央與地方間之權責未能因應事勢，明晰釐定，致隔閡未盡消除之故」。⁶尤以面對日本極欲侵略中國的新一波國家威脅，中央政府卻只能以安內作為前提，緩圖生存之計。

民國25年，是國民政府面臨危機與轉機的一年。在軍事上因剿共摧毀了中共在南方的大部分根據地，並因追擊流竄共軍，使得以深入以往中央勢力所不及的雲貴川康地區，對地方實力派展開實質的控制。惟此同時，西北、西南反蔣勢力卻大舉集合，如西北的張學良、楊虎城與中共暗中往來串連，有形成大聯合政府之趨勢，導致「西安事變」的發生；而兩廣地區陳濟棠、李宗仁等，則公然舉兵反抗，也弄出「兩廣事變」出來。⁷整個情勢，看似對中國抗日形勢造成巨大危機，幸在全國人民企求團結的呼聲下，經南京中央的和平手段處理，終未進一步釀成內戰，甚至凝聚形成空前團結的氣氛，一致面對日本的侵略陰謀。及至26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，全面抗戰爆發，不僅國民黨內部能夠團結禦侮，就連一向與國民政府作對的中共，亦在情勢使然下，不得不團結在中央政府的旗幟下，共赴國難。

3 蔣永敬，《百年老店國民黨滄桑史》（臺北：傳記文學，民國82年），頁174-175。

4 郭廷以，《近代中國史綱》（香港：中文大學出版社，1980年），頁591-609。

5 《國民黨興衰史》，頁264-265。

6 引自劉維開，《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—從九一八到七七》（臺北：國史館，民國84年），頁367。

7 周美華，《中國抗日政策的形成：從九一八到七七》（臺北：國史館，2000年），頁228。